

社交媒体时代华人移民的跨国网络^{*}

张 焕 萍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深度访谈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华人移民跨国网络建构和归属感形成中的深刻影响。本文认为,数字化互动已经融入华人移民的跨国家庭实践当中,成为重塑移民跨国家庭实践的重要媒介和重要场域;作为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的重要平台,社交媒体对移民的社会资本获取与维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使移民的个人社交从传统的“强连接”转向基于虚拟网络的“弱连接”;此外,社交媒体促进了华人移民的远程适应,使其对归属感有了新的理解。本文最后提出,社交媒体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等挑战,还可能加剧文化孤岛效应,阻碍其社会融入,需要移民进行更为深刻的适应。

关键词 华人移民 社交媒体 跨国网络 社会资本 小红书

国际移民是社会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具备更高的流动性,该群体受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也就更为深刻。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口的流动与媒介信息的流动并行加速,尤其是自 2010 以来,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流通的速度和强度大大增加,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移民的跨国生活方式,也重新塑造了他们的跨国关系网络,改变了他们迁移的经历和感受,为其形成新的归属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国际移民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研究焦点集中于数字媒体与移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与跨国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全球流散景观。实际上,这一关注点正体现了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媒介景观”(mediascapes)和“族群景观”(ethnoscapes)的交集。^①正如阿帕杜莱所言,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的加速流动,每个国家的国境内都不再是单一的或原生群体;各个群体既处于迁移之中,又通过复杂的媒体功能保持着相互联系。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全球进入“天涯若比邻”的新时代,它不仅促成了跨地域、跨国家和跨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也在不断重塑着移民的身份和社会网络。

一、文献回顾

移民的媒介使用一直是国际传播学界的经典议题,至今已形成丰富的理论基础。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帕克(Robert E. Park)就探讨了移民如何通过媒介使用在新环境中构建文化身份的问题。^②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者开始更多关注跨国移民群体如何利用新兴数字媒介与祖籍国和东道国建立联系。21 世纪以来,社交媒体平台的广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文社交媒体对美国华人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影响研究”(项目号:24BXW009)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审稿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美)阿尔君·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

^② (美)罗伯特·E. 帕克著,陈静静、展江译《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泛应用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相关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区的影响,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交媒体在维持移民与原籍国联系中的作用。研究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具有“时空压缩”能力,使移民更容易保持与家乡的远距离亲近关系,从而增强了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①二是社交媒体对移民融入东道国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不仅增强了移民群体的信息共享和社交互动,还促进了他们在东道国的社会参与。^②三是对移民的认同与归属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影响着移民的身份认同,为移民创造了新形式的情感关系和归属感。^③具体到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学界尤其关注微信对华人社区的影响。研究提出,微信在海外华人新移民中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增强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融合。^④

已有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不过,专门针对华人移民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仍比较匮乏,尤其是实证研究较为不足。世界移民组织发布的《2022 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共有 1000 多万中国移民分散在世界各地。^⑤然而,传统上,国内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在探讨华人移民问题时往往不太重视传播媒介的作用;而传播媒介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亦较为有限。虽然近年来这一现象有改善趋势,^⑥但对于这一庞大且复杂的群体,其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影响仍有待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移民研究和媒介研究的相关理论,从认知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社交媒体对华人移民群体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了华人移民的跨国家庭实践?社交媒体对华人移民的社会资本获取与维护以及个人社交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了华人移民的归属感?本文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增强对当前国际移民群体的深入理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广义上的“华人移民”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且多元化的群体,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世代、迁移背景、社会经济条件的移民个体。为保证研究的聚焦,本文主要集中于第一代移民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群体。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这一群体面临着更为复

① 相关研究如: C. Licoppe, “Connected Presenc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pertoire for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 Chan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2, issue. 1, 2004; L. Komito, “Social media and migration: Virtual community 2.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62, no. 6, 2011; Mirca Madianou and Daniel Miller,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② J. M. Brinkerhoff, *Digital Diasporas: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Engagemen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Sandra Ponzanesi,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a Digital Age: (Re) Mapping Connectivity and Belonging”,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vol. 20, no. 6, 2019; Jay M Marlowe, Allen Bartley and Francis Collins, “Digital Belongings: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Cohesion,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 Media”, *Ethnicities*, vol. 17, no. 1, 2016; Andoni Alonso and Pedro J. Oiarzabal (eds.), *Diasporas in the New Media Age: Identity, Politics, and Community*,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10; Veikou Mariangela, Siapera Eugenia, “Rethinking Belonging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Migration and Presence”, in W. De Been, P. Arora, and M. Hildebrandt (eds.), *Crossroads in New Media, Identity and Law: The Shape of Diversity to Com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④ Wanning Sun, Haiqing Yu, “Digital/Social Medi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ustralia”, *Media Asia*, vol. 43, 2016, DOI: 10.1080/01296612.2016.1277826; Yujie Chen, Zhifei Mao, Jack Linchuan Qiu,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Sun Wanning, Yu Haiqing, *WeCha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22.

⑤ 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2021 年 12 月 1 日,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2>, 2023 年 10 月 15 日浏览。

⑥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已关注到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介使用,如陈亚丽《社交媒体与海外华人的身份构建:基于对瑞士华人女性移民的微信使用的研究》,载《新闻春秋》,2017 年第 1 期;杨恬、蒋晓丽《在美国旅居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动机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3 期;张焕萍《社交媒体对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微信对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为例》,载《青海民族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杂的社交媒体环境。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通常包含东道国主流社交媒体和祖籍国社交媒体,涉及与母国、东道国以及其他移民群体的复杂互动。因而其社交媒体上的使用体验往往更加多样化,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世代移民的特征。其次,该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反映了他们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维系联系、获取信息、重建归属感的具体实践。相较之下,社交媒体对这一群体的跨国互动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在本文写作之前,笔者已经长期关注该领域,并通过数次问卷调查对华人移民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有了大致了解。这有助于更全面了解海外华人移民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行为及其对身份和归属感的影响。为获得更深入的见解,笔者于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9 月进行了 34 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 34 名不同背景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其中,28 位来自问卷调查的参与者,另外 6 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招募。访谈采用 Zoom 和微信语音两种方式进行。访谈内容集中于他们个人的移民经历和对社交媒体在塑造其跨国关系、日常生活及归属感等方面作用的深入理解。本研究的受访者均为第一代移民,涵盖北美洲、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五个大洲 15 个国家,年龄范围在 23—62 岁。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访谈样本情况*

序号	移民国家	样本数量(人)	受访者性别、年龄(岁)
1	美国	7	女 42、女 36、女 29、女 41、女 39、女 60、男 36
2	加拿大	7	女 23、男 46、女 55、男 39、男 62、男 33、男 27
3	澳大利亚	4	男 39、男 50、男 44、男 42
4	新西兰	1	女 45
5	荷兰	1	女 58
6	法国	1	女 36
7	意大利	1	男 39
8	爱尔兰	1	男 29
9	瑞士	2	男 45、女 32
10	芬兰	2	男 39、女 32
11	英国	3	女 31、男 36、男 49
12	新加坡	1	女 40
13	日本	1	女 22
14	马来西亚	1	男 35
15	肯尼亚	1	男 31

* 资料来源: 本表为作者自制。

根据调查问卷,绝大多数华人移民均使用社交媒体,第一代移民几乎人人使用微信。虽然因所在国不同,受访者对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有所区别,但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共性:所有受访者均通过手机平台使用各种社交媒体,如 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X (Twitter)、Line、抖音 (TikTok)、微信 (Wechat)^①、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已成为他们日常社交的重要渠道之一;华人移民经常使用微信与中国内地的亲友保持联系,“与国内的亲友联系”“获取中国的信息”和“商务功能”是华人移民使用微信的最重要目的;小红书、抖音、微博、知乎等其他基于中国的社交平台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有使用,大部分受访者同时使用两个以上的社交平台。^②

三、社交媒体连接的移民网络

今天,社交媒体已成为世界各地华人移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的数字技术使得连接无处不在、快速且即时,从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弥合了物理距离,直接改变了华人移民的迁移体验及其调节距离的方式。我们可以从跨国家庭实践、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个人社交三个维度窥视社交媒体对华人移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 从银信到微信: 跨国家庭实践的变革

“家庭实践”是理解移民跨国家庭日常互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社会学家大卫·摩根 (David Morgan) 提出,家庭实践是指人们通过日常活动赋予彼此之间关系以意义的方式。^③这一概念强调,家庭并非一个静态的社会单位,而是一系列动态的、不断通过互动得以建构的关系集合。根据这一框架,家庭关系的维系更多依赖于日常实践中的具体行动,而非静态的身份认同或地理位置。对华人移民而言,传统的跨国家庭实践多依赖物理空间的互动,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移民家庭的实践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

从 19 世纪中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身在美国的广东移民通过银信 (侨批) 与家乡的亲人保持联系。这种银信形式不仅用于经济支持,也承载着情感交流,是早期华人移民跨国家庭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不过,银信传递周期过长,难以让跨国家庭之间形成即时性沟通。进入 20 世纪后,跨国电话实现了声音的即时传播,但高昂的费用使其使用范围有限,无法形成移民与跨国家庭之间的“持续连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电子邮件的兴起虽然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降低了成本,但仍然难以满足跨国家庭成员对情感同步和“共在感”的需求。直到进入 21 世纪,尤其 2010 年以后基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社交平台 (如微信等) 的普及,才彻底改变了华人移民跨国家庭的互动体验。与传统的通信媒介相比,社交媒体整合了文字、语音和视频等多模态交流方式,不仅便捷、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实时互动和多样化的表达形式,非常接近面对面的交流,能够为移民家庭成员提供一种持续的“共在感”,近似物理上的“共同在场”。^④这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直接催生了“空间的毁灭”和“距离的消亡”,让分散在不同地域的家庭成员得以维持持续的亲密关系,不仅克服了传统通信方式的局限,也为情感支持和跨国家庭日常协作创造了全新的可能性。

今天,华人移民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进行跨国交流。社交媒体不仅为其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还重新定义了他们跨国家庭的互动模式。所有在国内有直系亲属的受访者均表示,他们频繁地

① 抖音和微信均有国际版,分别为 TikTok 和 Wechat,但不少受访者在访谈中将两者的国际版也称为“抖音”和“微信”。为行文方便,本文中不再区分国际版和国内版。

② 对于华人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及原因,笔者已撰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参见张焕萍《从“双重缺席”到“共同在场”: 华人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③ David Morgan, *Rethinking Family Practi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6.

④ 张焕萍《从“双重缺席”到“共同在场”: 华人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使用社交媒体与国内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联系,虽然与其他亲戚的联系没有那么频繁,但这种联系对他们而言仍有重要意义。这种持续的跨国交流使远距离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持续的联系,并提高远距离亲密关系的质量,这已经成为很多地理上分散的华人移民家庭跨国生活的新模式。正如一位受访者描述的那样:

现在实在太方便了……我几乎每天都在跟父母联系。要么是发微信朋友圈,要么是视频通话,告诉他们我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天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所以,在他们来温哥华探望我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了很多我在这边的生活细节……虽然离得远,但我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女,23岁,加拿大)

可以看出,借助社交媒体的日常化的交流,远离家乡的华人移民依然能够深度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强烈的沟通体验,让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脱离自己的家庭,甚至有的家庭亲密关系还因为社交媒体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作为独生子女,移民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我根本不敢想自己能离开父母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来到新西兰。那时候虽然有网络,但我爸妈都不会用电脑。……有了微信就方便多了。现在,我仍然很想他们,但是我们能随时通过微信沟通、(在线上)见面,距离感就没那么强了。(女,45岁,新西兰)

社交媒体帮助移民克服与亲人分离的情感障碍,提供了与亲人保持联系的情感和心理支持,而且极大地减轻了他们对远距离家庭的担忧。一位39岁的意大利男性受访者描述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孩子的成长:

我确实不能陪孩子一起玩,不能时刻陪伴他们,但是我并没有缺席他们的成长。我依然在尽力扮演一个爸爸的角色……我经常通过微信视频远程督促孩子写作业,有时候甚至还通过网络摄像头帮我老婆看孩子。(男,39岁,意大利)

不难看出,数字化互动已经融入华人移民的跨国家庭实践当中。如果说早期跨国移民靠银信、包裹进行跨国家庭实践是基于物理空间的传统形式,那么今天,移民的跨国家庭实践已经拓展为依托数字空间的新形式。华人移民及其跨国而居的家人可以更方便地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障碍,共享日常生活、互相对话、提供情感安慰,甚至共同进行家庭决策。通过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维度的互动,移民跨国家庭构建起新的亲密关系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不仅是重塑移民跨国家庭实践的重要媒介,更成为其重要场域。

(二) 数字桥梁: 移民社会资本的获取和维系

社会资本是理解移民跨国网络的重要概念。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人拥有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来源于制度化的相互关系或认可关系所构成的持久网络。^①换言之,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对其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三个维度。^②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强调网络的广度和密度,以及个体通过这些连接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认知性社会资本侧重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共享价值观的构建;关系性社会资本注重人际关系的质量和互动的深度,强调情感支持与互惠关系。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

①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The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6, pp. 241–258.

② J. Nahapiet, S. Ghoshal,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no. 2, 1998.

的重要平台,对移民的社会资本获取与维系产生了显著影响。笔者以为,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框架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华人移民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构建和维系社会资本。

1. 结构性社会资本: 社会连接与资源的拓展

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为华人移民拓展其社会网络、通过更广泛的连接获取丰富的资源和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一点在华人移民准备移民和刚迁移到东道国的时期尤为重要。所有 2010 年后移民的受访者,无论其移民是通过什么方式,均表示,社交媒体为他们在移民准备阶段提供了重要信息。他们借助微博、微信、知乎、小红书等平台,获得了大量关于住房、就业、教育和生活安排等各方面的实用信息。对于 2016 年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名受访者来说,早在移民加拿大之前,他的家庭迁移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我关注了加拿大华文媒体的微信公众号,还通过朋友引荐加入了一个多伦多当地的华人微信群。我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比如知乎、微信、微博、YouTube 上搜集移民多伦多的“指南”,不仅包括住房、求职、学校、购物、领事馆等这些大类的信息,还包括这里的气温,吃什么不吃什么,我甚至找到了相关的攻略,出发时准备什么行李,第一周做什么,等等。所以,在我到达多伦多的那天,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需要怎么做。(男,46岁,加拿大)

社交媒体不仅能快速传递信息,还通过多样化的网络连接,降低了移民的迁移成本和移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相比传统的亲友网络,社交媒体上信息的多样性和广度,能够很好地弥补移民线下信息不足的短板。一位受访者分享道:

我们和中介签合同时,对爱尔兰唯一的了解就是它在英国边上。甚至对于它是说爱尔兰语还是英语我都不清楚。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封控,也没办法出去考察考察再决定。所以就只能依靠网络,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疯狂找资料,慢慢去了解爱尔兰的一切。后来,我们还真找到了一群同样准备去爱尔兰的当地人,大家互通信息,互相鼓励。(男,29岁,爱尔兰)

不得不提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不仅涵盖政策法规,还包括根据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实战攻略”,这对于那些准备移民的人来说往往更有借鉴意义。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更多“草根”移民可以获得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相似的信息资源,无形中缩小了信息鸿沟。如果说在网络信息不那么发达的时期,华人移民之间的信息差往往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那么今天,社交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移民之间的“信息差”,移民对信息的掌握情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交媒体的利用程度。

前几年的时候,我去荷兰交换,那时我是我所在的英国学校唯一一个去乌特勒支的人,没有人可以一起交流。你知道,荷兰是一个小众的留学国家,网络上没有多少经验帖,那时候小红书也没这么流行。以至于我很晚才找到中国留学生的组织。那时候,我真是“无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自己摸索:签证怎么办?住宿怎么申请?非常吃力。……现在,找信息简直太方便了。光靠各种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就够用了。比如,你要来英国,在小红书上从申请就有人出教程,接着 offer 也有教程,申请宿舍有攻略,办签证也有全流程攻略,超市买什么、中超平替都非常具体。(女,31岁,英国)

结构性社会资本的获取与移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年轻一代移民对社交媒体的熟悉程度更高,他们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一平台拓展社交网络,进而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相较于年长一代,他们也更乐于通过社交媒体建立广泛的虚拟连接,因而年轻移民在借助社交

媒体平台拓展其结构性社会资本方面,通常表现得更加高效和积极。

2. 认知性社会资本: 信任与共享价值的形成

社交媒体为华人移民提供了一个跨国的互动平台,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具有相似背景和经历的个体建立联系,从而获得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分享和互动,移民群体在文化认同和情感支持方面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形成不仅仅是信息交换的结果,更是通过共享的文化、经验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的获取在华人移民使用中文社交媒体平台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通过微信、小红书等基于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找到了与自己境遇相似的移民,并通过互动建立起认同感,获得了文化上的共鸣与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说,基于祖籍国的社交媒体在帮助华人移民扎根东道国的同时,还加深了他们与祖籍国及全球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和情感联系。他们虽然从未面对面接触,却能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亲近感。一位名古屋的年轻移民提到:

因为 IG (Instagram) 里面很多内容是外国人写的,他们即使是看相同的东西,也可能是以中国人以外的角度去看,意思和我们华人不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用 IG 会少了用小红书那种亲切感。另外,当你长时间用它(小红书)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跟得上潮流,在中国年轻人的世界里没有脱节。(女,22 岁,日本)

另一位受访者也提到自己在小红书上与其他华人移民以及祖籍国的互动:

我觉得它(小红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小空间,经常在上面分享我在美国的各种生活瞬间,吃喝玩乐,也不需要有什么顾忌。那些给我回帖的大部分是国内的,也有很多国外的华人,从 IP 看,主要是美国的,还有就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家总喜欢对比国内外和各地的生活。比如上周我的发了一小段“room tour”(房间参观)的视频,在跟帖中大家就开始讨论和对比世界各地的房价,温哥华的啦,加州的啦……就是有一种亲近感,感觉我们是同一类人。(女,36 岁,美国)

通过生活经验的分享,这位华人博主不仅建立了与全球华人群体之间的认知性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形成了跨国的“想象共同体”。笔者发现,不少华人移民也正是出于这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利他的行为,分享自身的移民经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实用信息的交流,增强了华人移民群体在情感上的联系。一位受访者谈道:

我根据自己移民十几年的经验,在抖音、小红书上发了不少短视频,比如“如何不被黑中介忽悠”,“租房避坑指南”,什么“刚到澳洲必须下载的 APP”,主要给想要移民的人一盏指路明灯。都是中国人嘛,大家相互帮助。(男,50 岁,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孙婉宁曾提出,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华人新移民较多的国家,微信正在用过去几十年无法想象的方式促进华人社会的融合。^①实际上,这一现象并不限于微信。近年来,如小红书、抖音等其他中文社交平台,也日益被华人移民广泛使用。这些平台通过连接全球的华人,逐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跨国“线上华人社区”,并成为移民共享资源与经验的空间。华人移民通过这个空间建立起广泛的认知性社会资本,他们在平台上分享和互动,互相传递文化价

^① Wanning Sun, “WeChat’s Potential for Social Activism and Civic Actio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December 10, 2020, <https://gia.georgetown.edu/2020/12/10/wechats-potential-for-social-activism-and-civic-action-in-the-chinese-diaspora/>, 2023 年 11 月 5 日浏览。

值、生活经验和信息,反过来又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可以说,这种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积累,让华人移民不仅获得了生活上的实际帮助,也在情感上得到了支持,加深了他们与祖籍国及全球华人群体的紧密联系。

3. 关系性社会资本: 深度互动与互惠支持

尽管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常常是碎片化的,看似缺乏足够的情感交流,但它依然为华人移民建立深层次的关系性社会资本提供了可能性。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有时可以弥补传统社交方式中的空缺,尤其是在移民初期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过程中。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个人情感和生活点滴,华人移民可以感受到一种“虚拟陪伴”,从而有效缓解在异乡的孤独感和文化适应上的困难。一位移居休斯敦的受访者提到:

刚来 Katy(休斯敦市凯蒂) 的时候,非常想念上海的繁华,跟国内比,Katy 的生活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所以我经常跟国内的朋友联系。但也不能总微信视频,所以我开了小红书账号,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都在里面分享。……它们陪我熬过了最初的寂寞。(女,29岁,美国)

此外,社交媒体还有可能将线上的虚拟关系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有受访者提到,他们通过线上互动结识了朋友,后来发展成线下的友谊。例如:

有个朋友是在小红书上认识的。我妈妈来这边之前跟她咨询过很多问题,比如关于租房、购物之类的,她每次都很有耐心的回答。来这边之后,妈妈跟她成了好朋友,加了微信,前段时间还约了一起吃饭。(女,36岁,法国)

可见,社交媒体还可能为华人移民提供建立深层次、持续性的社交关系的机会,与他人建立跨越地理界限的情感联系,形成长期的支持网络。一个肯尼亚内罗毕的受访者提到,自己加入了当地一个将近 500 人的华人微信群,虽然群里大多数人并未见过面,但只要有人在群里求助,总会有其他人提供帮助。

那次晚上我朋友被狗咬了,我就在这个群发消息,好几个人帮着我出主意,还有人开车把朋友送到医院打疫苗……都是中国人,出国就显得格外亲了。(男,31岁,肯尼亚)

社交媒体还为华人移民提供了一个互惠的空间,移民通过分享个人经验、提供信息和帮助他人,建立起基于互惠原则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当他们在跨国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帮助和情感支持,这种互惠的互动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为其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总之,社交媒体对华人移民社会资本的获取与维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结构性社会资本维度,社交媒体通过广泛的资源和信息网络,帮助华人移民拓展了社会联系,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在认知性社会资本维度,社交媒体通过促进信任的建立和文化认同的增强,强化了华人移民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在关系性社会资本维度,社交媒体通过深化情感交流和互惠支持,促进了华人移民之间更深层次的社会互动。这种数字化的互动方式,为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社会融入、文化认同和情感支持赋予了新的可能性,成为其社会资本获取的“数字桥梁”。

(三) 从强连接到弱连接: 移民个人社交方式的变化

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华人移民社会资本的获取方式,还重塑了他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从传统的依赖亲朋好友的“强连接”,到如今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的“弱连接”,华人移民的社会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今天的华人移民在个人社交上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化和去地域化。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地理和文化的限制,使华人移民建立更为广

泛的社交网络。与早期的移民相比,他们能够很轻易地建立跨国联系,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互动。

二是社交的个性化。社交媒体带来了“网络个人主义”^①这一新现象,即社交方式不再依赖于物理空间和集体活动,而是转向了一种不受地域限制、更加松散和个性化的网络互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华人移民,他们已经不再像早期移民那样热衷于依靠传统的华人社团进行社交,而是选择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个人化社交,寻找更符合自己兴趣和需求的社交圈子。很多华人移民利用社交媒体加入了基于兴趣、职业、学习等不同领域的社群。这些社群不仅涵盖了多种多样的领域,如美食、旅游、职业发展、教育等,有的还跨越了国界。

这边的人情味特别淡……家长会开完,一个个都跑得贼快,什么约着喝个咖啡呀,想也别想。……邻里之间也是,一起住了三年,点头微笑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努力了。……对我来说,现在最热闹的地儿反而是社交媒体上这种虚拟的地方,大家看我发的视频,给我点赞或者在下面评论。在网上也认识了一些共同爱好的,偶尔约着一起户外徒步和滑雪。
(男,39岁,芬兰)

三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多样性使用。很多华人移民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之间切换,根据沟通对象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社交平台(如 Facebook、WhatsApp、WeChat 等),展现出他们在复杂媒体环境中的灵活性。不少受访者提到,自己注册了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平时会根据沟通对象和需求的不同而选择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有位受访者解释说,为了与所有的人保持联系,需要多样化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对他而言,Facebook 通常用于维持在东道国建立的友谊; WhatsApp 更多用于与工作相关的各种联系; 而使用 Line、KakaoTalk 和微信,则主要是因为不同来源地的人往往更喜欢某个特定的有族裔特色的社交媒体。

移民到芬兰后发现当地人更喜欢 Facebook 和 WhatsApp,所以自己就使用 WhatsApp 与当地人联系。我还有 Telegram,因为上面有很多有用而且有趣的群组。(女,32岁,芬兰)

整体而言,华人移民在个人社交上体现出一种从“强连接”到“弱连接”的转变。传统上,华人移民往往通过亲属、同乡或朋友之间的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本,这种紧密的关系网络也是他们获取支持的主要途径。比如,受访者王先生(男,62岁,先移民美国后移民加拿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移民美国时,他的好几位亲戚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在当地扎根。他到美国后经亲戚介绍加入同乡会,同乡会为他这个“新移民”在住房、工作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而今天,很多华人新移民并不属于那种传统的、紧密联系的纽带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松散的、频繁变化的弱连接网络关系中。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这种弱连接的关系对移民而言也逐渐变得更为重要。

必须提出的是,传统的线下社交方式依然在移民的社交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受访者表示,虽然社交媒体扩展了他们的社交圈,但线下的社交往往更值得信任,尤其是在涉及更为重要的事情时。比如,对于一些涉及华人族群利益的事务,主要还是依赖传统的华人社团牵头开展集体行动。因此,社交媒体并未取代传统社交方式,而是两者并存、相互补充,共同帮助移民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交网络。

^① “网络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一词由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提出,学者多用其表示互联网时代人们更为灵活和个人化的网络。这一概念表达了网络时代人们联系和组织方式的转变。参见: B. Wellman,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8, no. 3, 2006。

四、流动的生活与多重归属

“归属感”通常与“家”的概念紧密相关。在传统观念中，“家”被视为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是归属和情感联系的核心。然而，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家”的含义也变得更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根据文化适应理论，移民的归属感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理位置，而是通过持续的情感联系和跨文化社交网络的维系得以实现。^①这意味着，“家”不再是固定的、实体的家，而是一种“归属的感知”，或者说一种熟悉感、安全感和持续连接的状态。^②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变化，使移民重新定义“家”的含义，并在流动的背景下塑造新的归属体验。

（一）流动的跨国惯习

社交媒体极大地增强了移民的流动性和跨国联系，移民的社会网络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点，而是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动态联系。这种变化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灵活的生活选择，也促进了其跨国惯习的形成。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华人移民在心理上产生了“在世界各地都有家”的感觉。这种心理和行为方式背后，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赋予移民的跨国互动能力，使其能够在跨越国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游刃有余。而这在二十多年前社交媒体不那么发达的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李明欢教授提出，当今中国人口的跨国流动表现出“逐梦留根”的新动向，移民当事人往往从个人和家庭的发展策略出发，对东道国持“临时观”，合则留，不合则离。^③这一点在笔者的访谈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一些华人移民在定居东道国之后，仍存在着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三位受访者本身就曾经移民过两个以上的国家。他们刻意保留对未来选择的开放性——虽然努力在东道国生活，但同时也准备在将来某一天回到中国，或者移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比如，一位受访者提道：

我从来不认为我就一辈子在这儿了，说不定等孩子大了，我还会回北京生活，而且孩子们也说不定会回国发展。……咱是进可攻退可守。（男，44岁，澳大利亚）

这种心态与社交媒体在维持全球联系方面的作用息息相关。访谈中，笔者感受到，社交媒体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更新对其他国家、生活方式和移民机会的认知，同时也让他们在心理上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全球化的流动生活方式。另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们到美国4年多了。我们打算再移民到意大利。……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趁年轻，我想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无论在哪儿生活，我都会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小圈子。（女，39岁，美国）

这一现象在移民子女身上尤为显著。他们“继承”了父母的跨国生活方式，这种流动的跨国惯习在他们身上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一位移民说：

我儿子正在以国际化的心态成长。他很清楚自己是中国人，来自中国。这边的学校教他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他会说中文、英语和法语，通过微信跟姥姥姥爷聊天，用WhatsApp跟同学联系。他16岁，已经开始考虑以后是不是要去欧洲定居。（男，46岁，加拿大）

数字化时代，移民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灵活。借助社交媒体，移民不断更新着对不同国家和生活方式的认知，并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活策略。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域，而是在多个国家和文化间灵活穿梭，形成了全新的跨国生活方式。

① J. W.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46, no. 1, 1997.

② N. Yuval-Davis,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Intersectional Contest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1, p. 10.

③ 李明欢《逐梦留根：21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二) 数字时代的“家”

国际移民研究学者蒂米奈斯库(Dana Diminescu) 认为,移民对归属感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移民策略和定居计划,而这些往往会受到包括社交网络在内的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① 社交媒体促进移民形成了新的跨国惯习,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归属感的感知。对他们而言,“家”不再是个静态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被虚拟网络和情感联系不断重塑的流动空间。能明显感受到,华人移民的归属感不仅植根于祖籍国,也植根于东道国社会,此外,由于不少人经历过二次移民或者有再移民的计划,他们的情感归属至少包含祖籍国和东道国两个国家,表现出“双焦点”乃至“多焦点”的取向。

一位 90 后的受访者比较典型,他 2017 年前移民到加拿大,2022 年下半年又来到澳大利亚当一名叉车工,但他并不打算留在澳大利亚。

来澳洲半年后,当同事知道我不打算留在珀斯时,表现得很惊讶,觉得既然来了怎么也该想个办法拿个 pr(绿卡),但我没有这个打算。虽然加拿大有它的不足,但它现在是我的家,我知道我一定会回那里继续我的生活。……我在那里有归属感,这个归属感是我现在在北京也体会不到的,尽管我很多亲人都在北京。现在我对卡加(卡尔加里)的感觉就像当年离开北京后对北京的感觉一样。(男,33 岁,加拿大)

通过社交平台,移民不仅维持了与家乡的联系,还通过这种互动强化了他们在东道国的社会网络和情感归属。社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双向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与家乡的情感连结,另一方面也支持了他们在东道国的融入和适应。一位移民提道:

我在澳洲 16 年了,早就习惯了三明治、汉堡,都没问题。但如果你问我最爱吃什么,那肯定是炸酱面、韭菜鸡蛋馅儿饺子。老家的朋友一直都有联系,有家人群、同学群。每次回北京,我就喜欢约上哥们儿撸串儿、喝啤酒。(男,42 岁,澳大利亚)

此外,社交媒体还让移民在面对突发的挑战时,能够保持心理和情感上的稳定。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微信成为维系华人移民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通过这个平台,移民能够随时与家乡的亲友交流,获取了重要的情感支持。一位受访者表示:

尤其疫情以后吧,在家也不出门,反而成天和国内最铁的两个闺蜜微信聊天。都十几年了,还是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远隔重洋,大家三观都差不多,一直没间断联系。平时微信朋友圈点赞的还是国内的朋友多。……再也没有像国内那么亲的了。(女,45 岁,新西兰)

这种虚拟的“家”的感觉,不仅帮助移民保持与家乡的联系,也让他们在全球流动的流动生活中,维持情感的稳定,克服异乡生活的孤独感。

此外,今天的华人移民大多能够战略性地协调自己的多重归属。比如,对于一些受访者而言,虽然在情感上更接近祖(籍)国;但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日常生活已经脱离了中国。

年纪越大越想家,但孩子们都已经在这边扎根了。我现在很清楚,不会再回到老家长期生活了,所以我必须得学着享受在美国的生活。……在当地也有一些朋友,但是感觉没那么亲。我更喜欢跟老家的亲戚朋友聊天,跟我姐姐妹妹呀,比在这边的朋友更亲切。(女,60 岁,美国)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时代的华人移民已经学会“从这里到那里”的转变,并认识到在东道国的适应不仅不会削弱他们自己的身份,反而有助于他们在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更好地协调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华人移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种“世界主义”生活方

^① D. Diminescu, “The Connected Migrant: An Epistemological Manifesto”,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47, no. 4, 2008.

式,并不断努力适应流动的现实。通过虚拟社交网络,移民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维系联系,并在多个文化之间自由切换,形成了流动、跨国和多维的归属感。对他们而言,“家”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定义,而更像是一个流动的,由情感支持、社交互动而构建的多维度空间。

五、结 语

社交媒体不仅加速了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流动,而且在新的层面影响着移民个体和群体的生活体验。它让华人移民在物理上位于一个地方,而在社会和文化上保持与全球多个地点的紧密联系。这种持续的连接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和文化边界,使移民在东道国与祖籍国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跨国生活方式。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华人移民群体,而是全球国际移民群体的普遍经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社交媒体已成为连接国际移民与其社会、文化根源的关键纽带。移民借助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新定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

不过,社交媒体同样为移民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信息鉴别与过度依赖问题。首先是虚假信息、错误观念和偏见的扩散,威胁到移民个人的信息安全和心理健康。访谈中,也有华人移民谈及自己被社交媒体上“黑心中介”欺诈的经历。其次,虽然社交媒体为移民提供了与祖籍国保持联系的便利,但它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强化移民的“文化孤岛”效应,加深移民群体在原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情感裂缝,或导致移民过度依赖虚拟社交而疏离现实中在东道国的社会融入。

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势不可挡,整个国际移民群体都需要在此背景下进行更深层次的适应:一方面加强对信息源的辨识能力,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东道国社会,建立更为坚实的社会联系。社交媒体作为跨国网络的工具,应该成为帮助移民融入和建立社会资本的积极力量,而非疏远与隔阂。这不仅需要个体层面的努力,更是全球移民政策和跨国社会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of Chinese immigrant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It holds that digital interaction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and field for reshaping the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 of immigrants.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ocial media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capital for immigrants. It also shifts the personal social interaction of immigrants from the traditional “strong connection” to the “weak connection” based on virtual networks. Furthermore, social media has facilitated the remote adap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enabling them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The article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social media also brings about challenges such as false information, and may exacerbate the cultural island effect and hinders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which calls immigrants to make more profound adaptations.

Keywords Chinese Immigrants Social Media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Rednote

(张焕萍,副研究员,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北京,100007)

(责任编辑:石茂明)